

著 娜 林 格 安

點之要主最



行 印 局 版 出 籍 書 文 國 外
科 斯 莫 。 年 一 五 九 一

K83

4





著 娜 林 格 安

點之要主最

(答回的題問上表歷履的來寄國美對)



行 印 局 版 出 籍 書 文 國 外

科 斯 莫 。 年 一 五 九 一

譯 翻 成 李
訂 校 浩 昌

我收到從美國寄來的一封信。一位相識的女教員把信的內容給我翻譯出來了。信上說，在紐約市大馬路二九六號門牌，要出版一部「世界名人大全」，內中將刊載各國名人的履歷。

信上還解釋了「名人」這一概念：第一，是聯合國的各領袖，第二：原子彈創造人，隨後才是其他科學、藝術、文學、工業方面的活動家。

在一張印有世界地圖，地圖上又繪有一卷厚書的表格紙上，編輯人通知我說，普拉斯科維姬、安格林娜代表的名字已列入「世界名人大全」，請我填寫同時寄來的履歷表。

除了通常幾項（姓名、生年、籍貫等等）之外，履歷表上還得填寫我「從開始供職起到目前止」的一切職務，所獲榮號和獎章，供職地點和寓所，父母和兒女的名字及官銜，軍事獎章和已刊行的著作及其他許多問題。

我回答如下：

「安格林娜、普拉斯科維姬、尼吉梯奇娜。生於一九一二年。籍貫（同時又是供職地點和寓所）是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斯大林省斯達洛貝舍沃村。父親安格林、尼吉達、瓦西麗也維奇是集體農莊莊員，從前當過雇農。母親安格林娜、葉菲密姬、菲多洛夫娜是集體農莊女莊員，從前也當過雇農。我於一九二〇年「開始供職」，即同父母一塊給富農當長工。一九二一

至一九二二年間，在「阿列克塞也沃——拉斯念斯克」煤井裏，當運煤工人。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又當雇農。一九二七年起，先在共耕社內，後來在列寧集體農莊內當過馬夫。一九三〇年直到現在（除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我在莫斯科齊米梁節夫農業學院學習時中斷了兩年外），當女拖拉機師。我有三個孩子：大女兒斯維特蘭娜，兒子瓦列立依，二女兒斯大林娜。我從一九三七年起為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員。同時我還是土地機關工作人職工會會員。至於已刊行的著作，則有篇幅不大而於一九三八年在基也輔出版的「我帶領的拖拉機隊」一書，此外，還有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的關於組織拖拉機隊工作以及農業方面其他問題的許多論文和演講，其中我講到自己的工作經驗，試圖將自己的工作加以分析。至於說到軍事獎章，我可把我那枚「近衛隊員」章算上，這是在戰時由我們經常幫助的前方一個砲兵旅的軍人們因我在大後方困難條件下工作中成績卓著授給我的。我在第四七四選區，即安夫洛塞也夫選區，當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我的榮號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斯大林獎金獲得者，蘇聯農業展覽會大金質獎章獲得者。我榮獲的獎章中，有二枚列寧勳章，一枚勞動紅旗勳章和幾枚獎章……」。

這個履歷表竟如此詳細，甚至問到我結婚的日期或母親結婚前的姓氏等細節。但在這一詳細履歷表上，卻沒有主要的問題：究竟我這個從前一字不識的雇農，是由於什麼才成了國務工作者，成了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的呢？

在這履歷表寄來以前很久，另有一封從美國寄來的信上向我提出的，却正是這樣一個問題。那封信是亞拉巴馬州的農民孟夏門、馬丁寫給我的：

他關於自己的情形，只簡短地說了一句話：「Very bad」。這話的意思，用不着翻譯，我就明白是：「Bera」*。

馬丁並沒有問到我結婚的日期。他想要知道的，是為什麼在蘇聯能有像我這樣的履歷：雇農——拖拉機師——國務活動家。

我經常收到「阿美利堅」畫報和「不列顛盟友」雜誌**。據我看來，那上面登載的許多東西都是盡情粉飾的，而與馬丁所訴述的苦處完全相反。但這裏我所要說的，是另一回事：在這兩種外國刊物上，常常描繪到什麼「飛黃騰達」和「非凡」的履歷。

例如，我記得那裏張大其詞地描寫過一位（據雜誌上所說）是「從人民中間出身的」大人物履歷。他從前是個普通的報販，後來發了大財，成了好幾家報館的主東，竟晉陞為貴族院議員。當時我心裏想道：若在那部「世界名人大全」上並列印出兩個人的履歷——即我的履歷和貴族院議員的履歷（我在「A」字母內，而他在「B」***字母內）。關於他寫着：「姓名，生年，結婚日期，父母貧寒，從前是報販，後來成了貴族院議員」。關於我寫着：「姓名，生年，結婚日期，父母貧寒，從前是雇農，後來成了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

* 英語「Very bad」是「很壞」的意思，俄語「Bera」是「倒楣」的意思，兩句話的發音大致相同。——譯者按。

** 「阿美利堅」畫報是在美國出版，「不列顛盟友」雜誌是英國大使館在莫斯科出版，現已停刊。——譯者按。

*** 是指英國貴族院議員比瓦布魯克(Birchall)而言。

——這有什麼區別呢？——我的美國朋友孟夏門、馬丁及成千累萬與他相同的人，在讀過這兩人的履歷後，定會這樣問道。

是的，若不提出「由於什麼？」這個問題，就不能了解和正確估量蘇聯人的生涯，我個人的生涯也在內。須知主要之點並不在於我個人；而在於我的昇進並非非凡的。如果那位大人物確如雜誌上所描寫的那樣，是「從人民中出頭」，是「從人民中出身」而成了貴族院議員，那末，我則是同全國人民一塊出頭，是同全國人民一塊成了英雄的。主要之點就在這裏。

所以我要越出「世界名人大全」履歷表問題範圍，把這一主要點拿來——與其說是向貴編輯部，不如說是對美國千百萬農民——敘述一下。同時我很想藉此來回答我們蘇聯遼闊國土上各個地方的同志所寄來的千百封信上經常重複着的一個問題：「芭莎，你是怎樣長進的呢？」。

現今站在蘇維埃政權三十年的高峯上，來回顧一下我們大家已經過的歷程，回憶一下我們國家這令人興奮的歷程，而同時也就是我們每個人的歷程，是我國人民的歷程，——這是特別適當的。我們的命運同國家的命運，同黨的命運竟如此密切結合着，致使在回想起自己的工作 and 成就，回想起自己的苦痛和快樂時，就不由的憶想到有比個人履歷更重大得無比的事情。

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好東西，我們所知道的一切事物，我們所賴以富強幸福的各種成就，都是蘇維埃政權勝利這個大原因的結果：

我駕駛拖拉機已經多年了。這不「僅僅是我的職務」。這是我在為完成我國各屆五年計劃而鬥爭中的位置，是我在衛國戰爭時日的戰鬥崗位，是快樂、豐裕、光榮的泉源：

「拖拉機」這一概念，對於我個人和全蘇聯人民說來，不僅意味着「帶有內燃發動機的曳引機器」，而且具有更大的意義。拖拉機幫助農村革新了全部生活，它消滅了把土地機體分成無數段塊的地界，它把千百萬農民拖進了集體農莊生活中：

說到拖拉機：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十三年前，克魯普斯卡婭在教育人民委員部接見我們之後，把我們一群農村女青年帶去參觀列寧陵墓的情景。

我們屏住呼吸，繞着列寧靈柩走了一週：當我們由陵墓內出來走到紅場上時，克魯普斯卡婭小聲說道：

——他理想過要給俄羅斯十萬輛拖拉機哩！

當一九三〇年春我初次駕駛拖拉機時，我還不知道列寧的這種理想，也不知道已經有了成萬萬拖拉機的事實。在一九三〇年間約六萬名拖拉機師中，只有我一個人是女子，當時我是第一個女拖拉機師。這點在那時，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却瞭解到——與其說是從智慧上，不如說是從心靈上瞭解到——斯大林和黨在農村中所開展的事業是如何偉大，規模是如何廣闊。

這是一九三〇年，即為建立集體農莊而進行勝利戰鬥，並完成了農村生活偉大轉變的一年。這是在熱烈執行第一屆五年計劃的時候。

當時在遼闊無限的蘇聯國土上，到處都有新建築工程出現；而在各地建築人員前列邁進的，照例都是青年。

我們斯達洛貝舍沃村的青年，晚上就集聚在本村俱樂部內，大家蹬在五年計劃建築工程地圖旁邊，暢談我國底未來和我們個人底未來。在我們的心目中，前後兩者都是光明遠大而彼此不可分離的。

我們中間誰也未曾想束手等待未來：我們青年團員這些積極有爲的人，在本村緊張澎湃生活中所起的，遠非微末作用：

然而當時我總以爲在我們住慣了的斯達洛貝舍沃村以外，是在進行更加重大、更加困難的事業。因此，我很想到某處建築場上去作工，並且一定要到五年計劃中的重大建築場上去作工。我貪饞地看報紙上滿載着的這類廣告：「徵求工人……」

有時我想到遙遠的西伯利亞去建築庫茲涅茨克這座未來的花園城，有時又想到德涅泊爾河上去建築水電站。究其實也可以不必到遙遠的地方去，因爲我們的斯達洛貝舍沃村是位置在頓巴斯正中心，所以無論你離開村子向哪一方走去，你都能夠找到重大的建築場所：既可到哥爾洛夫斯克機器製造廠或克拉馬托爾斯克機器製造廠的建築場所去，也可到著名的魯特清科煤井或「亞速鋼鐵廠」的建築場所去：

我的三哥依萬再三向我說明，五年計劃在我們斯達洛貝舍沃村內也會實現着的。但我當時不同意他的說法，總想到外邊某個地方去。

正在這時，依萬——他是全區內的第一個拖拉機師和村內黨支部書記——忽然間被派去學習。於是我就打定主意，要代替他充當拖拉機師（當時根本就沒有「女拖拉機師」這個名稱）。

起初大家都譏笑我，但因州裏沒有派人來代替依萬，而拖拉機終究停着，所以領導人就同意來考驗我一下。原來我從二哥那裏已多少學會一點摩托，經過不久的補充訓練後，我就考中了。當時人們對我說：

——讓你去搞吧。你可要小心些……

於是在一個很早的清晨，我首次駕駛拖拉機到田地上去。這時天氣寒冷，面頰凍得有點發熱。我的拖拉機響動着。我却總是向後張望；看到我耕起的第一壟土，好似黑浪般在後面起伏着，上面升起了一縷縷的熱氣；當時我高興得要大唱起來，要用全力叫喊起來：

我就這樣打定主意要當拖拉機師，也就這樣當成了拖拉機師。

「要當，就當成了」這句話，現在說起來當然很容易。但在當時一九三〇年春天，這是多麼困難，多麼吃苦受氣的事啊！

然而我是不怕困難的，也沒計較過自己所費的精力。當時我才十八歲，但我已經是個「老青年團員」了。青年團員對於各種困難，都習以為常了：許多困難已經渡過，許多困難還在前面：一九三〇年時，我們斯達洛貝舍沃村內所發生的事，也如全國各地許多鄉村內所發生過的事一樣。富農被擊潰並被趕走了。成立了列寧集體農莊。拖拉機在取消了地界的田地上耕作。所有這一切都是費了很多氣力後才達到的，而在當時，這還是很軟弱的一些幼芽。

我還記得，父親常常半真半假的說，他是「家庭黨支部」的主席。當時他本人和我的大哥瓦西里，二哥尼古拉和二哥依萬都是共產黨員，而我和弟弟科斯卡及妹妹列麗姬，則是共產青

年團員。成立集體農莊，剝奪富農財產，進行鼓動工作——凡此種種，我們全家人也同黨支部及青年團支部一起擔負了起來。

我們有這樣的家人，真是幸福！

從一九二七年起，本村內就成立了一處共耕社。當時富農還牢固地把持着土地，他們還強大有力。而我們則只是剛剛開始學習經營。

那時共耕社裏，非得用富農的農具、耕畜及簡單收割機不可。

共耕社內分配糧食產品時，不只按勞動力計算，而且還按農具、耕畜及機器等計算。

結果是我們的老仇敵，即從前我們全家人一連多年替他幹活而只領得微少報酬的富農薩溫，仍然比我們的日子過得好些。他把自己的馬、牛及馬力收割機交給共耕社使用，自己却不作工，但他所分得的糧食，竟比整個夏天都在田地上勤勞苦幹的安格林全家七口人所分得的，要多好幾倍。

當時大概不只我們一家人想要達到另一種較為公平的制度。農民們都期望在農村中建立這樣一種制度，使收穫的糧食將歸勞作者享受，而不是歸惡霸們享受。

於是我們有遠見的黨，就引導農民走上集體農莊生活的道路。「農業勞動組合章程」，正是我們所望眼欲穿的制度：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在教堂前面廣場上召開的那次村民大會。我的父親本是一個嚴肅寡言的人，他在那裏是生平第一次當衆講話。我還記得他所講的每一句話：

——莊稼漢，你們看，這裏有一堆石頭。一大堆石頭：不要說用一隻手，就是用一隻腳，就可把它踢散。——這時父親好像是要證實自己的話，就用靴子向石堆上面的一塊大石頭一踢，整堆石頭就嘩啦一聲滾散了。——你們看吧：石頭放的不平穩，不整齊。要是拿這堆石頭築成一道牆壁，那就踢不散了！把石頭一塊對一塊的安放好，放得恰恰合縫，不要留一點空。用這堆亂七八糟的石頭這樣來築成一道牆壁，那就用九牛二虎之力也是推不倒的。我們這些如同這堆亂石頭一樣各幹各的莊稼漢，也要：也要這樣結合成一個集體農莊：要心對心地結合起來，就像石頭和石頭結合起來一樣。那時，這就會變成銅牆鐵壁，任憑什麼也戰勝不了它！父親在說完話後就走下了教堂台階。接着大家却死氣沉沉，默然無聲。平常開村民大會時，總是吵嚷得很厲害：甚至捐募點錢來建築一處籬柵的小事，都要引起喧嚷爭鬧：然而這裏所說的是生命攸關的大事，是給大家開放光明的大事，但大家却默不作聲：

爲什麼這些只舍沃村的農民都默不作聲呢？

當時我們村裏的情形，大概也像全國各地許多鄉村裏的情形一樣，是很複雜的。中農猶疑不定，等待觀望；害怕弄錯吃虧。一切農具，都操在列福特洛夫，薩溫，安東諾夫，巴尼奧托夫等富農手裏，他們很有勢力。所以大多數村民，由於因循慣習，縱然不尊敬他們，但總還是害怕他們。

可是我們一家人却不怕：

我們一家人就挺身前去反對那些還強霸有力，對新制度持極端憎恨態度的富農。

有人給貧農委員會主席瓦西里、安格林偷偷放上這樣一張字條：

「主席，你從村裏滾蛋吧！不然就要揍死你」。

可是共產黨員瓦西里，不僅沒有「滾蛋」，而且頑強地繼續作自己的事，雖然字條上寫的恐嚇話不是空談：富農當時真的殺害過農村積極份子。

一九二九年夏天，當我同弟弟科斯加和妹妹列麗姬一塊，到隣近諾沃貝舍沃村去開青年團員會議的時候，有人向我們背後開槍。當時我們還是小姑娘（列麗姬不滿十五歲，我才十七歲）。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倆怎樣在有刺的草裏光着腳跑，因受驚嚇，心臟跳得厲害；但當我們跑過了危險界，稍微喘過一口氣之後，我們並沒有轉回本村，仍前往諾沃貝舍沃村去開會：

有一次，富農把我們的老娘打得個半死，只因爲她是我們的母親，是幾個共產黨員底母親；我們一家人及與我家相似的許多別的家戶，原先世代都是給富農幹活。當時我們懂得，這些惡霸是我們的共戴天之仇。富農橫梗在我們達到好光景的路上，無論用什麼勸說、限制或重稅等辦法，都不能把他們去掉。

又是黨瞭解了我們的需求並指示了出路。當時，斯大林同志代表黨向我們指示說：要從限制富農轉到消滅富農階級：

當本村黨支部書記依萬、安格林夜間騎馬跑到黨區委宣傳部長——我的大哥瓦西里那裏去時，後者所重複的，正是這句話。

依萬從討論過關於成立集體農莊問題的村民大會上，帶着以下這不好的消息來到了黨區委會：

在村民大會上，當父親說完了話以後，富農巴尼奧托夫出來發言，他說：「安格林家的人『心眼手脚都不乾淨』：他們自己一無所有，却硬想與富戶均產。」

結果在表決的時候，舉手贊成集體農莊的只有七名貧農，反對的有十二名富戶。絕大多數農民（全體中農和幾名胆怯的貧農）則放棄了表決權，他們說：「將來再看吧，何苦去碰釘子呢？」村民大會在富農壓制下通過如下的決議：將安格林全家及舉手「贊成」的另外六家，從其耕社內開除出去，同時認為他們有權另行成立自己的集體農莊。

富農們還譏笑說：

——請你們去成立吧！去經營吧！七家共有五頭乳牛，外加兩隻山羊——這就是你們集體農莊底全部財產。

那時我們大家都是窮人。我們總共確實只有五頭乳牛和兩隻山羊。黨區委宣傳部長瓦西里在用黨的名義回答依萬所提出的「以後怎麼辦」這個問題時，終於說道：

——要剝奪富農財產，把他們的土地和農具沒收過來，就用這些東西來開始經營。無論如何也要成立集體農莊，那怕只有七家也好。

我們七家人就這樣開始來成立集體農莊。

當時我親自參加過剝奪富農財產的事情。這是緊張激烈的階級鬥爭時日。但只是在把富農擊潰並把他們從土地上趕走之後，我們這些無產者才覺得站穩了腳根：

集體農莊的倡首人們是很苦的。整頓經濟費了很大的氣力，大家從早到晚勞苦工作：並且經常覺到全村人都帶着試探心理來觀察我們。當時每個人都知道：在村民大會上放棄了表決權

的大多數農民，即中農和幾名貧農，將跟着誰走這件事，是要看集體農莊底成敗怎樣來決定的。

這時黨和國家就來幫助這批初成立的集體農莊。尼古拉、安格林「紅色農藝師」（大家這樣稱呼他，是爲要把他與怠工的舊專門家區別開來），由黨區委派來推行新式農藝學。區蘇維埃執委會撥給了我們勞動組合一筆貸款。而主要的是發給了我們一輛拖拉機。這輛拖拉機馬上就把一切動搖不定的農民，拖進集體農莊生活中來了。

起初，個體農民們常到田地裏，一連幾個鐘頭來看第一個拖拉機師依萬、安格林用拖拉機耕地。

後來在我們集體農莊管理處每次會議上，總要討論若干個體農民請求接收他們加入勞動組合的申請書。大概當時全國各地的情形都是如此：

我們把自己的集體農莊命名爲列寧集體農莊。

出現了第一批集體農莊：「甚至在這些集體農莊的名稱，如『向共產主義邁進』，『依里奇遺教』，『爭取文化』，『幸福生活』等等名稱上，也包含有莫大的希望和信心。

我們的生活在當時還沒有達到幸福的地步，我們這些普通人那時還不知道，蘇維埃政權以及集體農莊制度和工業化，究竟會使我們達到怎樣富足快樂的高峯。但黨和斯大林却已經看清到：在經過了前面許多巨大困難之後就必然達到的這種高峯。

我們都信任黨和蘇維埃政權，我們大家都跟着斯大林走：

在三十年代初，我國正處在急劇高漲時期。走上坡路，總是困難的：

我們的列寧集體農莊，也如隣近的一切集體農莊及全國的集體農莊制度一樣，經住了初次的嚴重考驗，而在村子內確立了起來。一九三〇年春，當我頭一次駕駛拖拉機的時候，我們集體農民雖還沒有享受到新生活的果實，但已經堅決不渝地相信到這種新生活：

我開的第一輛拖拉機是「福僧」式(Фопхон)。這是一種笨重的，複雜的，摩托帶有重旋轉輪和笨發火器的拖拉機。大概美國把這種拖拉機賣給我們時，是按照以下的原則：「我既用不着，就請你拿去用吧」；——這拖拉機甚至在那時就被公認是已經陳舊的了。只要有一根頭髮落到摩托旋轉輪裏，或發火器稍一發潮，拖拉機整天就不能使用。

開動摩托，平常要由五個人一齊動手，並且還得大費氣力。這「福僧」式拖拉機消費的燃油非常之多：深耕一公頃土地，要費油六十公斤，現今的拖拉機只費油二十至二十五公斤就夠了。

過了兩年，當我國工業化的頭批產品——新「ХТЗ」式拖拉機運來區裏的時候，我們大家都愛上了這種拖拉機。並不僅因為這是我們蘇聯哈爾科夫拖拉機工廠白造的，而且因為這工廠出產的拖拉機，比「福僧」式可靠得多，簡單得多，省油得多，所以很快就代替了「福僧」式拖拉機。

後來我還駕駛過許多其他種類的拖拉機：如「齊略賓斯克」式(ЧТЗ)，「斯大林」式(СТЗ)，「拿梯」式(НАТИ)以及燒煤油的，外洋的「法爾摩里」式(Фармор)拖拉機。於是我就日益深信到，我開始駕駛的，原是最難開和最佻皮的一種拖拉機。

可是在一九三〇年時，我却愛上了自己駕駛的那輛又笨重又複雜的拖拉機，並很害怕駕駛不了它或是會把它弄壞。